

法 政

百年学术精品

通识教育高阶读本

政治学与法学卷

..... 这是一柄 20 世纪学术刻度尺。用它

..... 可以丈量人类刚刚走过的那个世纪的

..... 思想高度!

刘大椿 李 韬 主编

百年学术精品

通识教育高阶读本

政治学与法学卷

刘大椿 李 韬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识教育高阶读本·百年学术精品·政治学与法学卷/刘大椿,李韬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300-16543-1

I. ①通… II. ①刘… ②李… III. ①社会科学—著作—内容提要②政治学—著作—内容提要③法学—著作—内容提要 IV. ①Z89: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5146 号



通识教育高阶读本——百年学术精品·政治学与法学卷

刘大椿 李 韬 主编

Tongshi Jiaoyu Gaojie Dube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17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 (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 (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38 插页 2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06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选导言

一、编选缘起与书目分析

（一）编选缘起

目前，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讨论莫衷一是，仁智各见。但是，对于当代缺乏大师、罕见精品的批评，却是少有的一致。何谓精品？哪些著作称得上精品？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中国古代的《论语》，古希腊的《理想国》，你能不认可吗？！然而现当代呢？就并非一目了然了。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竟然对现当代的学术精品毫无概念，感觉模糊，那么，谈何精品，论何评价！

解决此一难题的比较省事的方式，便是设法开列一个近百年的学术精品书目。

书目的出现使阅读的选择变得简单，同时也使它变得危险。书目往往为名人所开，即所谓通古晓今、德高望重、卓然不群之士。但这里有两个前提假设，一是对名人的信任甚至崇拜，二是承认名人因其具有的学术声誉和导师心态自然享有特殊的“话语特权”。值得提请注意的是，在一个传统需要重建、文化需要寻根的时代，在一个充斥着现代主义话语霸权的时代，要想拿出一份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独具权威的“公共知识清单”，无疑是艰难的。而且这种艰难的背后隐藏着对新的“话语特权”的渴望和冲动，它们使得这项工作变得更加危险。

然而世上没有完美之事，危险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近百年来有无学术精品？哪些是学术精品？总得有一个答案。为了得到一份相对令人满意的精品书目，承担风险是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当然，如果用统计事实代替猜测，则

有望降低危险的程度。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曾经在 2005 年组织和开展一个题为“百年学术精品调查”的调研活动。调研虽然是在有限范围和规模下进行的，但掺入了某些新的理念，加上了数量指标和统计分析。希望通过该项活动，既能综合名人名家或知名院校开列的书目，又通过社会调查，用数字代替经验，拿出一份有一定特点和参考价值的近百年来的学术精品书目。

之后确立了一份书目，并缘以编选了百余篇提要。当时颇得共鸣和好评，特别是掀起了一场关于“学术精品”话题的讨论，进而推动了更多的人去思考中学与西学的异同，去梳理当代中国的学术历程，去唤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精品意识”，去挖掘“精品意识”背后的学理基础，去探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评价标准，去发现学术大师背后的精神底蕴。

（二）书目分析

距上次学术精品书目调研和提要编撰已过去七八年了，又有了一些新的意见和思考，但当年的基本理念和编撰工作，似乎尚能成立。根据当下需要，我们作了若干调整，主要是减少了部分偏重政治倾向而学术性稍弱的内容，增加了一些在相关学科中难以绕过去的著述。变动大概在四分之一左右。另外，对于作者简介、著作点评和节录的原著章节，也多有斟酌和改动。现共选出上一个百年的人文社会科学著述 112 部，其中中国作者署名的 38 部，外国作者署名的 74 部，分文史、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六大类。冠名为“通识教育高阶读本：百年学术精品”。企望更多的读者能够走近百年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品力作，通过跨学科地阅读与思考，拓宽知识视域，提升人文修养，达至通识教育之目的。

结合对上次调研的分析，我们对此次确定的百年学术精品书目又作了认真反思，对所揭示的问题得出了一些初步的思考结论。下面择要简述之。

1. 入选的和受关注的“学术精品”中，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居多

我们当初在设计调查问卷时，把中外“学术精品”书目的比例初定为 4:6 左右，目的在于基本反映人文社会科学的态势，尽可能关注和研究我们自身的学术问题，但从反馈的情况看，多数调查对象对国外著作的偏爱程度要远高于对本国学术著作的偏爱，这次编选又加大了国外部分，比例已超过 4:7。

这个结果应如何解释？中国现代学术史大致是中国走出经学时代，儒学中心主义被颠覆，引入西方学术范式的过程。正如李慎之所说：“从文明，再具体一点说是哲学，发轫之初的所谓‘轴心时代’开始，中学与西学就各自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西学是求真之学，中学是求善之学。或者换一句说法：西学一向从‘实然’出发，中学一向从‘应然’出发。这两个传统基本上互相隔绝而并行不悖地各自发展了3000年。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学碰上了西学，从此开始了相互冲突、摩擦、吸收、融合这样一个反复不已的过程，这就是现代的中国学术史。”^①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学术精品”，自觉不自觉地是以现代的或者主要是以西学的学术标准来进行评选的，若没有经过时间的筛选，在较短的时间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结果并不容易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的学术精品是比较少，但是并不奇怪。

在这里有必要提提“中学”与“西学”的区别。作为纯粹理性产物的知识、学问或者说科学，只应有真伪对错之分，而不应有中西地域之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纷扰纠缠中，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又的确积淀下了不同的思想习惯，而不同的思想习惯又会形成不同的学术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中学特别是儒家学术，与渊源自古希腊的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西方学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一般来讲，中学以践履为特征，知情意相结合，以伦理与政治水乳交融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严厉的、持久的、甚至痛苦的人格训练来确立道德的高尚与人格的完美，直至实现“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与此相适应，中国的辩证法“是处理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精确概念的辩证法。由于强调社会的稳定、人际的和谐，它们又是互补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的辩证法。它的重点在揭示对立双方的补充、渗透和运动推移以取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而不在强调概念或事物的斗争成毁或不可相容”^②。而西学是抽象思辨的学术，它的核心理念是独立与求真，是为学术而学术，在多数情况下它表达的是人类“认知的兴趣”，体现的是“方法重于结论”的基本观念。

在亡国灭种的现实面前，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中国的学术注

^① 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载《开放时代》1998年第5期。

^②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289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定要经历同西学不断地冲突、摩擦、融合的痛苦而反复不已的过程。“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所有这些，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带来了许多优点和缺点。它在适应迅速变动的近现代生活和科学前进道路上显得蹒跚而艰难。”^①传统的学术正是这样转换成新的学术传统，这是学术的宿命，这也是孱弱中国的宿命。在这个过程中，注定要痛苦的是学者，注定要反复的是思想。

反观国外，经济上强大的国家在学术上同样出色，而学术的强大又反过来影响这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观察一个民族的历史以至命运，自然以政治、经济、社会为主，但是要分析到最深层。最核心的问题，那就非从学术，非从学术的出发点研究不可。”^②西方学术的精粹在于“求真”，是超越价值判断的对事物本源的探知，为知识而知识的结果是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以及自然学科的分化，原因很简单，对世界本质的把握需要从不同的方向、层次进行认知。正如盲人摸象一样，只有把所有盲人对大象的不同感受加以恰当的交流和组合，才可能形成对大象的完整认识。盲人越多，感受的部位越细，组合起来的形象也就越清晰。至于“民主”、“科学”、“自由”与“人权”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准则，也是西方学术的传统追求，作为文化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是支撑心灵家园的重要支柱，也成为书写世界历史文化的重要画笔。

美国的精品书目在西方部分占据着重要比例，这一点同美国于20世纪在西方的地位也是相当的。进入20世纪以来，整个西方世界的科学研究看起来像个盆地，而美国就是这个盆地的盆底。在重力的作用下，同自然科学一样，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也都不可阻挡地从欧洲流向了美国。尽管血管里流淌着的仍然是同样的基督教义、民主法治、自由主义的欧洲之血，但是美国对其自身独有的人文精神资源的充分利用却开拓了大片的思想沃野，

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289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② 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载《开放时代》1998年第5期。

创造了思想的“山颠之城”^①。从这个角度讲，“美国之为美国，既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又有其成体系的独特发展道路，对于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美国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值得研究的典型。这对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都适用”^②。自由的学术环境、多元的文化体系、求真的学术传统、强烈的自我批判、发达的大学教育等因素的综合造就了美国学术的主流地位，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点。

2. 中国部分的精品书目分布呈马鞍型

我们大致可以把中国部分的精品书目按其发表或出版年代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晚清以降至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书目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类书目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前出版的，这类书非常少，例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第三类书目是改革开放后出版的，这类书多为时新之作，面世不久，尚需假以时日考验，故而入选者也不太多。需要指出的是，这类书中倒是有部分书目成书年代比较早，但经过整理再次出版后影响较大，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原以英文发表于1939年，中文版问世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又如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他在1972年就已经带病完成了，但正式出版时间也到了1980年。

之所以20世纪前50年出现的学术精品比较多，应该同这个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又一个高潮期有关。“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侵袭，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③在这个时期，深受传统经学影响的“数百万吏士，问以大地、道里、国土、人民、物产，茫茫如坠烟雾，目瞪舌不能语，况生物、心伦、哲化、光电、农工、商矿之有专长新书哉”^④。号称经世致用的中学无法承担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西学给西

① 美国早期移民的梦想是建造一座“山颠之城”以此向世界特别向英国显示一个神圣的共和国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秩序。尽管这种设想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但建造一座“山颠之城”以昭示世界的使命却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信念。参见王晓德：《美国白人“使命观”的历史和文化起源》，载《史学集刊》1998年第2期。

② 《中国的美国研究》，载《美国研究》创刊号，19页，1987年春。

③ 张岱年：《国学大师丛书·总序》，转引自汤学智：《90年代文学理论批评走向考察（待续）》，载《文艺评论》2000年第3期。

④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载《康有为全集》第3卷，5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方世界带来的强盛成为促使国人迅速接受西学的药引，西方的学术观念、学术方法以及评估标准于是伴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得以迅速地传播，“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学术高潮期的出现以大师辈出、思想攻错、学派纷呈为主要标志。20世纪20—30年代是大写的、人才辈出的年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汹涌澎湃的文化交融、前无古人的思想启蒙构成了一幅纷纭复杂的图景，为那些通古今、融中西的学者创造了一个可以充分施展才情的学术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挥舞着的是“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洋溢着的是“自由”与“独立”的氛围，闪烁着的是思想与智慧的光芒，活跃着的是群星灿烂的学术大家。

于社会环境而言，20世纪头30年是混乱的，这种混乱表现为国力日衰、积贫累弱、外族入侵、内乱频仍，但于学术环境而言，这种混乱又表现为自由研究、独立创造、兼采中西、超越彼此，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梁启超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个时代是中国学术在这个世纪，在思想上能够享受到的较为自由的时代，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迭出、百家争鸣的时代。同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汉末魏晋时期一样，动荡的社会环境带来的往往不是学术天地的萎缩，而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废弛。质言之，学术之繁荣，并不一定以社会平稳划一为前提，反之，自由之环境、多元之思想，方是学界大家辈出、精品频现的重要原因。想来这个理由既可以解释20世纪前半叶精品书为何较多的原因，也可以回答为何“文化大革命”时期精品书几近绝迹的疑问。

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学术带来了新生的契机，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前功底就较好、“文化大革命”中又千方百计没有荒废学业的学者，一旦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其学术的创造力便又被重新唤起。思想的解放、全球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洗礼，都促使中国学术取得长足的进展。对西方学术的引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复兴，具有世界意义的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等，使得中国的学园一扫荒芜，重又变得生机勃勃。尽管在这种热闹中不乏浮躁，但较之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和“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学术界在体察了社会动乱与变革、经历了“欧风”与“美雨”来袭的躁动不安之后，那些倾心于学术事业的学人最终沉潜下来，对学术领域进行了新的挖掘和拓展，使之不仅同中国传统的文化衔接起来，而且逐渐具备了同世界对话

的品格。中国的学术一旦走上了其应有的发展轨道，学术精品的涌现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当然，正如我们现在还在反复品尝 80 年前的精品一样，当前的精品能否成为真正的精品，还有赖于时间的考验。

3. 中国部分的精品书目中属于人文学科的较多，社会科学的较少

费孝通的人类学著作《江村经济》深得其导师布·马林诺夫斯基的赞赏，并被中国学者认为“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中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因为该书事实上是三十年代初吴文藻等中国学术前辈力倡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一个直接成果”^①。可见，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并非没有重要的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但就整体而言，社会科学领域（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较之人文学科领域（如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公认值得选取的精品确实还是少了许多。其实不光这份书目是这样，李慎之曾在评论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一书中认为：“从第一批列为‘经典作家’的名单看，基本上也没有社会科学家，除非把历史学算上（而在有的国家，历史学往往算在人文学科的范围内，即中国古代的所谓‘文史之学’，或现代之所谓‘文史哲’）。此外，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一概没有。”^②无独有偶，陈平原在谈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时，开列的代表人物名单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严复、刘师培、蔡元培、黄侃、吴梅、鲁迅、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梁漱溟、欧阳竟无、马一浮、柳诒徵、陈垣、熊十力、郑振铎、俞平伯、钱穆、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张君勱等，与《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大体一致，并且也和刘梦溪一样，对于社会科学则注明是“另当别论”的。^③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社会科学本身的幼稚导致了其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中影响力的式微。严格来讲，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它们研究对象的侧重点稍有不同。一般来说，人文学科更注重研究社会的主体——人的尊严、价值、个性、心理等主观状态，而不像社会科学那样主要研

① 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载《读书》1994年第10期。

② 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载《开放时代》1998年第5期。

③ 陈平原：《西学东渐与旧学新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9页，注释22，1998年第1期。

究群体活动及其与客观世界的相互联系规律。^①进入现代以来，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冲击就是打破了过去按照经、史、子、集进行分类的传统，代之以现代学科的分类方法，把“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胡适语）。在这里，无论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还是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其概念大都是外来的产物。于我们自己来讲，这些都属于新知。然而，文学也好，哲学也罢，中国并不缺乏可以贴上相应标签的学科体系，人们可以肤浅甚至生硬地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所谓“现代学术”的框架。但我们显然还没有创造出可以应对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学术语言，从学术概念的确立到学术术语的使用，从学术体系的建立到方法论的采用，却少有自己的东西，在学术的生命周期中还处于幼年。这种事实上的幼稚陪伴着中国的社会科学走完了整个 20 世纪，贯穿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始终，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在这些领域不可能留下多少可供后世瞻仰的精品。尽管经过上百年的消化和吸收，社会科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毫无疑问，“中国学派”依然是一个光荣的梦想，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摆脱其幼稚的形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如同中国社会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一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近代中国学界的启蒙性质导致了社会科学地位不高。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学术界都充满了呼唤“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色彩。什么是启蒙？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什么是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我们在需要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却接受了他人的权威。我们为什么会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原因是我们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或者说我们太容易习惯于接受（常常是被迫接受）权威意识的统治。启蒙就是让我们颠覆权威，怀疑主宰，启蒙的精神就是怀疑的精神，就是批判的精神。启蒙，于清末的中国而言，就是怀疑中学，颠覆传统，重新行使思想的权利，呼唤“民主”与“科学”的回归。可以说，对“民主”与“科学”的呼唤和企求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史。从力倡批判和怀疑精神的意义上讲，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竟的事业。正是在对“民主”与“科学”的向往中，

^① 人本主义是人文学科的雏形。19 世纪下半叶，反对禁欲主义和封建的登记制度、追求个性解放、提倡世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研究人的思想信仰、价值、人格、尊严、感情的专门学科。

中国学术开始了向现代转型的过程。较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为关注人类个体精神与价值评价的人文学科显然在这个痛苦的、漫长的启蒙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欢迎，影响力也更大。

二、学术精品的现代诠释

（一）何为学术？

关于“学术”，有人认为应当把“学”与“术”分开理解。梁启超在《学与术》中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以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即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联系，凡百皆准也此。”严复在《原富》中也认为：“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

李慎之对梁启超和严复关于“学”与“术”分开理解的说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这种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中学笼统含混的毛病，还原了“科学”与“技术”的本来含义。但我们长期以来却习惯于直接使用“科技”一词，含混了“学”与“术”的不同内涵，造成了功利心膨胀，而为知识而知识，只问真理、不计功利的“科学”精神却极为沦丧。但许苏民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学术”同“学问”一样，作为一个联称词，没有必要或者根本不能从字义上加以分疏。“学”的字义，源出于卜筮的神秘暗示，后引申为启发人“觉悟”的教育之学，再假借为治学之学、学问之学、学术之学。“术”的字义，则从邑中道路假借为“道术”之术、“经术”之术。因为“术”与“道”含义相同，古人学以“闻道”，学是关于“道”的学问，所以“学术”二字亦可互注：术者，道也；术者，学也，学就是术，术就是学。^①

几位学者的立论有所不同，但强调的重点却较一致。李慎之认为“学”即“科学”，“术”即“技术”，“学术”的连用等同于“科技”的连用，但这种连用会抹杀“科学”求真的精髓。许苏民则是从“学”与“术”在中文的初始含义

^① 参见许苏民：《也谈学术、学术经典、学问与思想——对梁启超、严复、王国维观点的质疑兼评“现代学术经典之争”》，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出发认为“学术”不可分，并未把“学”与“科学”等同，“术”与“技术”并列；他同时还强调了“学术”的特定含义，认为学术就是知识、学问、智慧和方法论的统一，其中知识特指个别的、微观领域的窄而深的研究成果；学问是指特殊的、中观的、具体学科领域的系统化；智慧指普遍的、宏观的、整体的透视和理论概括。^①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无论把“学术”分开理解，还是把“学术”并列解释，两位学者事实上都强调了“学术”求真的本来含义，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没有分歧的。

一致强调“学术”的求真本意，于中国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对“学术”本意的揭示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中国学术从先秦的子学到两汉的经学，再到魏晋的玄学，从唐宋儒释道的合流到明代心学的变迁，再到清代朴学的兴起，前后相继的各种思潮之间自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然而人们之所以将这些思潮都归诸“传统”之列，是因为学术理念在近现代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传统与现代的分野于经济而言，在于生产关系的变革；于学术而言，则在于思维方式的变革。无论是子学、玄学或是理学，始终贯穿中国传统学术的精髓，与其说是“求真”，不如说是“求善”。“求善”之学，在本体论上不是表现为对宇宙本原是什么的终极回答，而是限定为“道”、“一”、“太极”等不可证真、不可证伪、却可通过个人的修炼予以体验的存在。这种体验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由于“道”与“天”都是既定的，是不证自明的，人们可以通过个人慎言去欲的修行实现人性的完美，所以，“人性善”的人性论长期在中国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方法论上，“求善”之学并不是以逻辑而是以践履为特征，人生的意义不可能在逻辑论证中实现，而只能在自己的人生修炼和人生实践中展开。^②只有到了近代，当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时，当人们发现单从中学孕育不出现代科学来时，才被迫开始了思维方式上的根本转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开始所接受的“科学”，主要是器物层面上的科学，是科学的形而下的声光化电。它们尚缺少科学的“求真”精神和学术的“自由”灵魂，很容易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使科

^① 参见许苏民：《也谈学术、学术经典、学问与思想——对梁启超、严复、王国维观点的质疑兼评“现代学术经典之争”》，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② 参见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174—180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学变成了“唯科学主义”，变成了“意识形态”。陈独秀“把科学看作一种武器，一种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他的确崇拜科学征服自然的能动作用，但他更把它看作一种反对‘迷信’的武器。与虚无主义者的情况类似，他的学识使他把科学与自然主义的粗陋形式混为一体。靠在科学的权威之上大声宣称物质原子是唯一的最终实体，他便迅速地铲除了‘礼教’（儒教），而且铲除了神秘主义的佛教、道教的全部基础”^①。当唯科学主义与政治结盟以后，科学在很长一段时期无可奈何地成了政治的附庸，并不具备独立之品格。因而，学术实际上并没有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其次，对学术本意的揭示有利于人们解除强加于学术上的束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不缺乏的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怀和对理想人格的终极追求。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心态，在亡国灭种的严峻现实面前，再次转化成反帝救亡的忧患意识和强国富民的“现代化”情结。然而单纯出于民族主义情结，人们往往局限于从物质的进步和发达来理解现代化，能够接受的仅仅只是“学术”带来的知识与技术，而不理解也不能消化蕴藏于“学术”深处的精神和价值。殊不知，所谓的“现代化”本身就蕴含着学术的独立与自治，而学术的独立和自治本身就意味着坚决反对在学术之外人为地预设任何非学术的目标。如果在学术的逻辑之外再预设一种新的逻辑，以致把非学术的需要看得比学术的逻辑更重要，甚至用功利的或政治的标准来衡量学术，就无异于否定了学术本身。

（二）学术精品释义

把“精”字和“品”字结合起来，再把“精品”同学术结合起来，“学术精品”的定义似乎可以表述为“完美的学术作品”、“学术作品中的精华”、“精雕细刻的学术作品”或是“成了精的学术作品”。

“成了精的学术作品”听起来有些可笑，想来却不无道理。若无百年、千年的苦心修炼，花儿依旧是花，草儿仍然是草，断然不会变成“花精”、“草精”，而一部学术作品，倘若没有时间的锤炼，没有“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精神，相信也不会成精，变不成“精品”。

^① 史华兹：《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兴起》，英文本第9—10页，转引自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45—4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尽管可以相对严格地厘清“精品”的含义，但如果没有比较的话，我们将很难对“学术精品”的内涵进行精确的界定。

人们在书上作下划线，目的是为了标出能够引起思考或是共鸣的地方，但全划上跟全不划的效果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比较。“精品”也是这样，“精品”只有在和普通作品或是假品、庸品、伪品、劣品比较的时候，才有意义，精品的“精”也才能有所体现。学术作品，作为纯粹意义上对知识和真理的探索 and 追求，从本质上讲，都应该以深厚透彻的学理内涵显示自身的理论创见和理论价值，都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对自然、对社会和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推向更高的层次。从这个意义上看，每一部学术作品都应该有相似的价值诉求，区别仅在于向真理推进的程度和速度之不同。换句话讲，真正的学术作品不会也不应该出现什么假品、伪品与劣品。但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学术精品”这个词汇在这个时代的反复出现，与其说是对所谓精品的追求，毋宁说是对学术庸品、学术假品与劣品的彻底反对。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庸、假、伪、劣？一言以蔽之，逐利倾向！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那么学者的利益在哪里？难道除了在探索真知的过程中享受到的精神的愉悦与满足之外，学者，被这个神圣的称呼所代表的群体还应该其他的利益追求吗？在马斯洛的理论里，人最高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什么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想要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本来样子，实现人的全部潜力的欲望”^②。对于真正的学者而言，“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找乐趣的人，是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③，这就是真正学者的自我实现，或者说，这种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就应该是身为学者的最大利益。当然，人还有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有归属和爱的需要，还有自尊和他尊的需要，学者是人，对这些人类基本需要的满足是他们能够实现自我的基础，但如果自我实现的全部内容只是功名利禄、吃穿用度的话，这些学者便不配做学者，最多也就

①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842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82页，人民出版社，1956。

② [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③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前言部分第1页，转引朱利安·本达（Julien Benda）的话。

博得一个“学匠”的名号而已。学者同学匠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学者的眼中，学术同自己的生命是融合的，而在“学匠”的眼中，学术却是只管肚子，不管脑袋的。

以上所讲的是造成学界赝品泛滥的主观原因，在客观上，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前赴后继地加入到“学匠”而不是“学者”的行列，是因为：首先，社会评价人的标准开始变化，在市场社会条件下，名利作为可以量化地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最直接、最简单的指标，在推动部分“学者”加快学术作品商品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所谓的“学术作品”迅速地转化成了名利与地位。与商人交换，学者们可以成为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言人，有名有利；与官员交换，学者们可以成为某些领域的专家，有名有位。在审批学术体制下，名利与地位又是获取学术资源、争取资金支持的重要前提。有了资源和资金，更多的“学术作品”就会接踵而至，如是之恶性循环，学术庸品、复制品遂满目皆是。其次，自17世纪至今，真正的学者，一直生活在世俗权力与理想之间持久的紧张状态中，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传统的学者越来越难维持其同社会的某种疏离状态，以履行其作为社会批判者的角色。相反地，他们越来越融合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与社会保持的是零距离甚至是零距离。当学者们被权势者或利益集团变成可利用的资源时，很难想象他们能够真正无畏地尽职于社会，成为社会良知的守护者。

（三）学术精品评品之难

在操作层面，是很难找到公认的评选“学术精品”的办法和程序的，其评品之难至少有三。

首先，学术精品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表现形式。既如此，人们也就不能轻易地用一种固定的标准在不同的作品间进行简单的比较。精品之丰富与复杂，袁行霈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所谓学术精品，可能是振聋发聩之作，一时间不胫自走，洛阳纸贵；也可能在当时并未产生轰动效应，甚至没有引起充分注意，但不管谁再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都绕不开它，嘉惠后人，历久弥新。所谓学术精品，可能是高文典册，洋洋数百万言，体大思精，茹古涵今，堪称集大成之作；也可能并非鸿文巨制，却筌路蓝缕，起例发凡，具有开拓之功。所谓精品，可能是独辟蹊径，解决了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可能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却

指出了方向，启迪后人走向解决问题的目标。所谓精品，可能以理论见长，光腾万丈，笔扫千军；也可能以资料取胜，经纬百家，洞烛幽微。”^①既如此，难道能为它们设定几个简单的形式、若干确定的数量指标吗？

其次，在学术作品中进行比较同时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比较者本人的主观感受必然会对评价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学术精品”可以是“完美的学术作品”，可以是“学术作品中的精华”。问题在于：“完美”是什么？什么是“精华”？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当然，这种主观不可避免地要建立在具有一定鉴别能力这个客观基础之上。这种鉴别能力既包括具备一定程度的学术积累和基本的学术素养，也包括具备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换句话说，我们既不能要求小学生来评价《正义论》是不是精品，也不能要求语言学家来评价《相对论》是不是精品。此外，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对社会现象的价值和意义作出判断和评价，对这种评价进行再评价，其中的主观因素就会更强，要想建立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来做比较也就更难。

最后，精品的评价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经常会选择时间而不是个人作为一部学术精品的最后裁定者。举例说，英国学者奥斯丁（John Austin, 1790—1859）生前只出版过一本没有什么影响的专著《法理学范围之确定》。但他死后，其夫人整理出版了他生前准备的大量的法理学讲稿，命名为《法理学讲义》。这本书却为生前默默无闻的奥斯丁带来了“分析法学之父”的赞誉。看来，人文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解释，现在要思考的社会问题也许古人早已考虑成熟，因此，有些在当时看似无用的著作，一旦能够对现实社会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解决一些实践性问题，这些著作必定会被重新估价。正因为如此，学术和文化的传承才会为我们所珍视，奥斯丁们才会不断涌现。从这个角度讲，时代并不总是对得起有学术建树之人，但思想创新一定不会被历史所辜负。

（四）精品不离大师

讨论学术精品，绝对离不开大师。所谓“大师”，是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

^① 袁行霈：《力戒浮躁恶习，再树学者风范》，载《中国高等教育》（半月刊）2001年第12期。